

# 何勤华：皓首穷经 甘为法治文明著春秋

□ 本报记者 王 宇  
□ 本报见习记者 薛金丽

## 光影流转，古稀不辍治学志

记者：何老师，看到2025年版《何勤华法学文集》问世，序言里您提到这是学生为您70岁生日准备的纪念。古人说“七十从心所欲”，此刻手捧这套文集，您的内心关键词是什么？

何勤华：我现在的状态，用“歇不下来”形容最贴切。如果是八九十岁了，或许可以谈谈“圆满”，但我现在总觉得自己还有活儿没干完。这套文集是对过去四十年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但我的案头还有很多“债”要还。

比如，2008年启动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律文明史》，16卷本目前出了13卷，还有3卷正在商务印书馆进行最后的编校；2020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法系与中华法律文化研究》，5卷里还有4卷正在法律出版社审校待出；还有2023年牵头负责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等等。这些大项目，每一个都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深挖、去雕琢。

记者：您已经著作等身，出版过130余部专著和合著，发表过300余篇论文，为何在古稀之年仍要倾注如此心力去大规模修订旧作，甚至续写第四卷《中国法学史》？

何勤华：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因为社会在变，学术成果在累积，社会在变，学术成果也在动态累积。比如“涉外法治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20年前我写《区域国别法律发达史》时，很多最新的国际法理论、各国的立法实践以及我们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都还没能涵盖进去。作为学者，著书立说，这不仅是学术生命的延伸，更是对文明足迹的守望。因此，补充新文献，吸纳新研究，让学术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是学者的本分。

记者：您曾主编《中国法学家访谈录》，记录了无数前辈的足迹。如今您自己也成了“被记录者”，您如何定位自己这代“77级法律人”的历史方位？

何勤华：我们这一代人常被戏称为法学界的“黄埔一期”。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新中国法治建设最完整的见证者，亲历者和记录者。

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我们这代人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职责，我们有几个共同特质：第一是有坚定的法治信念，那种对法治的崇敬是刻在骨子里的，因为我们亲历过没有法治的荒芜；第二是近乎狂热的勤奋，我们在农村、工厂被耽误了太久，深知学习机会的来之不易；第三是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时候我们晚上躺在宿舍床上，讨论的都是“天下兴亡”，这种使命感驱动着我们，必须在法学这块荒原上深耕细作，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 命运回响，弱冠磨炼向学心

记者：聊到那个转折点，1977年的高考对您而言极具戏剧性。资料中提到，您当时在公社当团委书记，高考数学竟然只考了28分，全靠文科的高分把总分拉了上去。如果今天“71岁的何勤华”遇见那个22岁的自己，您会对他交代些什么？

何勤华：我会告诉他：对未来要始终充满信心，永远不要放弃学习。

我是1955年出生的，16岁下乡，在农村待了将近7年。那时候我们学的物理化学叫《工农业基础知识》，数学只学到二次方程。高考时，有一道题是求一个六角螺帽表面的面积，我盯着那个图形，完全不知道怎么算。现在回想数学分低，但我最终能考上北大的原因就是，我从没放弃过学习。

# 警察的爱情

## 从虹桥的夜，到社区的晨

第三眼

□ 姜蓉

初次对师母怀有好奇，是一次与师父从外地出差回来。飞机降落机场时，已是下半夜。飞机刚一落地，师父就打开手机给师母发了消息：已平安降落虹桥机场，先暂不回家。师母竟然秒回。我不解地看着师父：“现在已经深夜，您又不马上回去，师母也是警察，何必打扰她休息呢？”

师父含笑解释：“这是我们结婚时的约定。双警家庭，她收到我的报平安信息，才能安心。”

跟随师父多年，只知他与师母是警校同学。回单位的车上，师父主动讲起他们的故事，仿佛这故事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终于在此刻流淌而出。

那一年，师父师母从警校毕业，双双进入分局不同的派出所工作，师母成为一名社区民警，而师父作为侦查系毕业的高才生，被分到了办案队。

年轻的师父是刑侦支队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只要辖区里一有案子，他就像上了弦的发条，没日没夜地在单位里开展侦查、抓捕、提审等工作，回家累得倒头就睡。新婚的师母难免有些抱怨，师父便把自己比作



## 人物素描

从1977年那个冰天雪地里的公社团委书记，到北京大学走出来的法学界的“黄埔一期”，再到掌舵华东政法大学十六载的功勋校长，何勤华的人生轨迹宛如共和国法治进程的一个微缩剪影。在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他却以一种近乎“苦行僧”式的自律，试图在纸堆中勾勒出全球法律文明的版图。面对采访，何勤华教授一如既往地坦诚：谈及往事，他不避讳那只有28分的高考数学成绩；谈及治校，他详述如何以制度创新为人才“破冰”；谈及未来，他那份作为法律人清醒而深沉的忧患感，化作了对话治文明传承的殷殷嘱托。

奈对文史知识的自学，正是这种长期的积累，让我能在其他科目上拿到高分。

记者：在那样一个信息闭塞，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幸运”，您认为是什么支撑您抓住了那次命运的机遇？

何勤华：幸运确实存在，但更重要的是韧性。当时我们公社有十几个年轻人，水平不比我差，但临考前因为害怕丢脸、怕考不上，放弃了报名。我常跟学生说，机会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而且当机会降临时，你必须要有勇气去抓住它，哪怕胜算看起来并不大。你不试，就永远没有可能。

在北大读本科时，我几乎是“抢时间”在读书，各个专业的讲座我都去听，文学、历史、哲学……这种综合性大学的滋养，决定了我后来做学问的厚度。我不仅学到了法律，更学到了法律背后的文明逻辑。

记者：您先后在北京和华政求学，这两所学府在您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怎样的烙印？

何勤华：北大像“国家队”，视野开阔，老师们更像“个体户”，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学术风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这种环境培养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华政作为专门性院校，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团队协作”，学科积淀深厚，专业化程度极高，特别务实。先有了“面”的广博，再有了“点”的深挖，这对我构建法学史的研究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双肩任重，制度“破冰”育栋梁

记者：担任华政校长的16年，被外界称为华政发展的“何时代”，在行政事务极其繁杂的情况下，您如何保持如此高产的学术产出？这种

“双肩挑”的内生动力源泉在哪里？

何勤华：“双肩挑”确实苦涩与快乐并存。说实话，搞行政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比写文章“开心”，因为行政工作是外向的，而写作是内向的、孤独的，甚至是极其辛苦的。

我的原动力其实很简单：我想成点事，想留点作品。至于产出，我有两个“秘诀”：一是自律，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写作，离开了笔头，生活就失去了味道；二是学会了发挥团队的作用，行政上我不搞事必躬亲，招生、就业、财务等具体事务，我鼓励分管副校长和中层干部充分担当。合理地授权，不仅锻炼了干部，也让我能挤出时间回到学术的“自留地”。

记者：在您的任期内，华政完成了更名大学、建设松江新校区等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在人才引进上，您曾采取了一些非常有魄力的“制度破冰”举措，这种勇气从何而来？

何勤华：法学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为了引人、留人，我们必须在引才机制上有所“破冰”。当时很多高端人才来到上海，最头疼的就是安家问题。按照当时的财务硬性规定，学校很难一下子拿出那么多专项资金，但我认为，学校的发展不能只算眼前的“小账”，要算长远的“大账”。我们通过党委常委会集体决策，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比如学校提供无息贷款资助人才购房。正是靠着这种敢于“破冰”的担当，我们引进了马长山、胡玉鸿、陈金钊等一批如今已成为学界中坚的人才，奠定了华政今日的学术底蕴。

学术深耕，文明深处觅渡口

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思想活跃的

“半瓶水”——只装了“理论”。他总说，不趁着年轻多历练、多积累，怎么用“实践”把瓶子装满？

辖区里发生了一起年轻人因口角引发的打架斗殴案件，师父立刻拿出饱满的干劲，与同事们全力开展嫌疑人追查、线索摸排、情报研判、行踪分析等工作，半个月后，他们成功锁定嫌疑人藏匿地点。

但嫌疑人负隅顽抗，试图从警方包围中逃脱，民警当即展开追捕，师父果断猛扑，与嫌疑人一同倒地，嫌疑人嘶吼着用双手击打师父头部，师父当场受伤昏迷，随后嫌疑人被其他同事成功制伏。

师父的伤势较重，被紧急送医后一度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师母已怀有身孕，仍坚持寸步不离地在病床前照料。直到师父苏醒，师母悬着的心才放下，泪水悄然滑落。师父拭去师母的泪水，回忆起当年相恋时，在他们家乡的海边，一轮明月下，海水泛起辽阔幽蓝的微波，两人曾立誓：心怀从警初心，坚守责任担当，全力维护一方平安稳定。

说到这里，师父羞涩地笑了一下，说：“其实你师母的内心也是善良坚韧的。”

师母的管片里，有一位早年丧偶的独居吴老太，平时喜好在网络上聊天。某日，一名自称某上市公司老总的网友主动与吴老太搭讪，频繁表达“爱意”，还以“带领投资理财，奠定美好未来”为由进行诱导。吴老太逐渐深陷骗局，最

年代，可供研究的法学方向很多。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法制史”——这个相对冷门且需要极高定力的方向作为安身立命的坐标？

何勤华：其实带点偶然。当时华政招收研究生时，法制史名额相对较多，对于想要回沪工作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真正进入这个领域后，我发现法制史能让人与现实保持一种理性的距离，它给了我极大的学术空间和思辨深度。

90年代有个“下海潮”，我认识一些做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转而去研究公司法，做大律师，经营企业了，但我始终没动摇。我常说，这种“冷板凳”一旦坐热了，就很有温度。

记者：您主持的16卷本《法律文明史》堪称一项学术壮举。这套丛书想达成的学术目标是什么？在组织如此庞大的协作工程中，您最大的管理体会是什么？

何勤华：我认为法律文明有三个标志：一套法律规范体系，一套法律理念、一套话语体系。当年张晋藩先生编了《中国法制通史》，李光灿先生、张国华先生领衔主编了《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但唯独缺一部《外国法制通史》。我当年的志向，就是想把人类上下五千年的法律足迹全部囊括进来，不仅是制度，还有思想、学说和文明成果。组织25所高校220多位撰稿人，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学术本身，而在于“耐心”。我曾为了一个子课题，等了撰稿人整整十年。作为主编，您要有耐心等那个“短板”补齐，只要你不放弃，团队就有凝聚力。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方法论，虽然慢，但足够扎实。

记者：您对“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的研究也很有影响力。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您认为，这两场审判留给我们的核心遗产是什么？

何勤华：这两场审判确立了“反人类罪”等罪名，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执行上级命令即可免责”的借口，也挑战了绝对的国家主权观——当主权沦为屠杀人权的工具时，国际正义必须介入。

研究这些审判的卷宗时，我常感到震撼，人类的罪恶有时超出了法律当时的想象力。所以纽伦堡审判其实是动用了“自然法”的理念——人类尊严和生命必须得到尊重，无论现在国际形势如何变幻，这两场审判对世界和平的坐标意义永远不会磨灭。

记者：您对自己未来十年的学术规划是什么？对当下年轻学子有何寄语？

何勤华：我的规划是“善始善终”。上天给我多少健康的岁月，我就利用这些时间把手头的项目排个序，先做最重要的，一件件收尾。生命不息，写作不止，这也许是我作为一名“77级法律人”终生不渝的宿命。

我想对青年法学子说，无论时代浪潮如何奔涌，外界环境怎样变化，都要始终葆有对法律规则的敬畏之心，坚守内心的良知底线。愿你们以所学所长，为新时代法治建设事业注入青春动能，助推法治实践阔步向前。



力透支支倒。彼时他们的孩子尚幼，师父便一边照料孩子，一边照顾师母。师母对此心怀愧疚，师父却宽慰道：“岁月流转中，我们学会了互相信任，彼此支撑，这些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力量。”

晨曦已透过繁茂的树林照到办案队的办公室，师父感慨道：“几十年婚姻时光匆匆，曾经爱情的激情虽随岁月沉淀，但爱情早已融入并肩从警的坚守、互相扶持的默契中，愈发厚重绵长，绽放出别样光彩。”

也许，这就是警察的爱情。

（作者系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新桥派出所民警）

□ 张月

寒潮掠过冀东平原，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2019年冬天，我怀着憧憬与忐忑，走进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检察院。在熟悉环境时，隔壁办公室门旁一块醒目的牌子牢牢吸引了我的目光——“高学林工作室”。当时我满心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位干警，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 一纸之疑，一生之志

答案在日常的接触中逐渐清晰。同事们提到他，语气里总带着敬重：“高科长”“老高”。他是丰南检察院重建以来第一位专业技术人员。他的世界，在放大镜下，在笔画锋芒与起收笔的细微颤动间，在纸张纤维与墨迹渗透的微观形态里。

关于他的故事，往往从1986年那个起点讲起。那年，刚结束专业培训的高学林，迎来了第一起实战案件：供销系统伪造签字冒领公款案，嫌疑人全盘否认。检材只有一张发票，侦查一度陷入僵局。面对如此困境，他埋头于检材与样本之间，通过反复分辨比对，从运笔的节奏、压力的分布、连笔的习惯，乃至笔画间微小的搭配关系中，寻找书写动力定型的本质反映。纸面之外，他反复研读案卷，揣摩人物关系与作案动机。经缜密分析，他果断扩大了嫌疑范围，最终根据检验结果又挖出了嫌疑对象之一的赵某之夫李某。首战告捷，不仅让纸上谈兵的理论在实践中淬火成钢，更在高学林心中点燃了一簇炽热而持久的职业火苗。

十年磨砺，厚积薄发。1996年6月，得知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将举办纪念文件检验专业建设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一直默默耕耘的高学林心潮起伏。十年间数百起案件的积淀，尤其是那个“第一案”的深刻体悟，在他脑中萦绕不去。他决定将思考付诸笔端。无数个夜晚，他在灯下翻阅当年的检验笔记，重新梳理逻辑，字斟句酌，最终，《一起夫妇合谋贪污冒领案的笔迹检验》一文一气呵成。这篇凝聚着基层实战智慧的论文，从全国检察系统报送的众多文章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终入选大会交流的14篇论文之一。那年11月，昆明湖畔，他第一次登上全国性的学术讲台，面对来自公检法司、政法院校的专家同行，略显紧张但条理清晰地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台下热烈的掌声，是对一位基层技术人员十年坚守的褒奖。

## 毫厘之辨，乾坤之定

从一案突破到三十八载深耕，支撑他的是近乎执拗的专注。检察技术工作远离庭审的激烈交锋，常年与静态文件为伴，他却甘之如飴。

他的办公室和家里，堆满了中外文检专著与期刊。他坚持手抄笔记，剪贴资料，累计数百万字；与领域专家保持联系，始终追踪前沿，这份坚持，结出了果实——180余篇论文在国内外中英文法庭科学核心期刊，研讨会上发表与交流，将一线经验升华为理论财富。

他的价值，更体现在一次次攻坚中。年均百件的鉴定量，高峰时达300余件。2010年4月，一起涉案2000余万元的职务侵占案摆到面前：票据被涂改、刮擦，多人签名真伪难辨……

他迎难而上。两个多月里，每天工作十余小时，提取检材票据822张，排除嫌疑票据28张，扩大并印证19张，提取嫌疑人董某某及涉案被摹仿人案前，案后样本258页，出具鉴定书71份，助力这起大案的侦查及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斯人之逝，精神之炬

2023年，高学林被确诊患上十二指肠肿瘤。病魔能摧毁身体，却囚禁不了他的精神。治疗期间，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依然是那些尚未厘清的鉴定线索和思考到一半的学术问题。在身体状况允许时，他仍会请同事将部分电子案卷送到病房，在病床上进行审阅和思考。组织和同事们多次劝他安心休养，但对他而言，沉浸于熟悉的专业领域，反而是与疾病相伴时光里的一种精神寄托。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当得知又有9篇凝聚心血的论文被专业期刊发表时，他感到莫大的欣慰。

那些在病榻上写下的文字，每一个都见证着他对检察技术事业深入骨髓的热爱与眷恋。

2024年冬，格外寒冷。临终前，他轻声对妻子吐露了一个心愿：希望穿着那身最熟悉的检察制服离开。

五十多载人生，他有太多牵挂：对家人长久陪伴缺失的歉疚，对未尽课题的遗憾，还有那三样朴素的“老伙计”——铅笔、放大镜、特征比表。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买了工具将家里每一扇门窗都仔细贴好密封条。这是他给相濡以沫的小家，最后一次沉默的守护。

又是一年深冬，再也看不到高科长在办公室穿梭的身影，但，当我们面对疑难案件时下意识的严谨，讨论技术问题时的引用的他的案例，面对困难时想起他病榻上的坚持……那些记忆，如同穿透厚重云层与凛冽寒风的一束光，不炽烈，却恒久地温暖并照亮着后来者的心田与道路。

（作者系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图为高学林生前在办公室查阅资料。 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检察院供图